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張煌言遺作的流傳及其史學價值

陳永明

印第安納大學歷史系

張煌言(1620—1664)，南明(1644—1662)抗清(1644—1912)活躍分子，由清初至今，中國史學家對他均予以高度評價，並將之視作典型的南明「忠節之士」，是歷來探討南明史所不能忽略的人物。然而，張氏遺世之作不多，而其流傳亦可謂災劫重重，先經兵燹之禍，復又遭清人查禁，幾經波折，方由全祖望(1705—1755)、章炳麟(1869—1936)諸人編纂成書。今試就史實所見，略考其成書之經過，並簡述張氏遺作在南明史研究上的價值。

張氏遺著流傳情況

張煌言從少即好寫作，登第之時，詩作已「歲久盈篋」¹，然而由於戰火及清代文網嚴密，²遺世文字非常有限，僅餘《冰槎集》、《奇零草》、《采薇吟》、《鄉薦經義》及《北征錄》數種而已。³《奇零草自序》云：

國難頻仍，……凡從前雕蟲之技，散亡幾盡矣。於時出籌軍旅，入典制誥，尚得於餘閒吟詠性情，及胡馬渡江，而長篇短什，與疏草代言，一切皆付之兵燹中。……

- 1 《奇零草自序》，《張蒼水集》(以下簡稱《張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頁51。
- 2 清代乾隆朝(1736—1795)曾藉修《四庫全書》為名，多次查禁文人著作，有關被禁書目，見姚覲元編《清代禁燬書目(補遺)》(上海：商務印書館，1957年。是書商務印書館曾以《清代禁燬書目四種》於1941年刊行，1957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再版，再版時增加了《補遺》)、孫殿起(1894—1958)編《清代禁書知見錄》(臺北：世界書局，1960年。是書原於1957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與姚書合刊出版，其後臺北世界書局將其收入《中國學術名著·目錄學名著》，第1集，第4冊中重印)及雷夢辰《清代各省禁書彙考》(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9年)。近人吳哲夫對於清代禁書目有詳盡之研究，可資參考，見吳著《清代禁燬書目研究》(臺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1969年)。至於有關清代文網的研究，可參考Luther C. Goodrich, *The Literary Inquisition of Ch'ien-Lung*, (New York: Paragon Book Reprint Corporation, 1966)；朱眉叔《清前期的文字獄》(《遼寧大學學報》，1979年第4期，頁60—73；第5期，頁75—82)；孔立《論清代的文字獄》(《中國史研究》，1979年第3期，頁129—40)；黃愛平《四庫全書纂修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年，頁40—100)。
- 3 見《張集》。

丁亥〔1647〕春，余舟覆於江，而丙戌〔1646〕所作亡矣；戊子〔1648〕秋，節移於山，而丁亥所作亡矣；庚寅〔1650〕夏，余率旅復入海，而戊子、己丑所作又亡矣。然殘編斷簡，什存三四。迨辛卯〔1651〕昌國再陷，而笥中竟靡有孑遺。何筆墨之不幸，一至於此哉。嗣是綴輯新舊篇章，稍稍成帙。丙申〔1656〕昌國再陷，而亡什之三，戊戌〔1658〕覆舟於羊山，而亡什之七。己亥〔1659〕長江之役，同仇兵燹，予以間行得歸，凡留供覆瓿者，盡同石頭書郵。……⁴

煌言所作詩文，經連番浩劫，本已鮮有餘墨，幸而自息兵入山，因他「思借聲詩以代年譜，遂索友朋所錄，賓從所抄次第之」，並且「憶其可憶者，載諸楮端」，⁵重新加以整理，散失文字方得結集成編。惟被執之後，此等作品亦隨之落入清人手上，幾與墨主同遭厄運。最後，幾經波折，手稿才流落民間，被有心人輾轉傳抄。

關於煌言遺著流傳民間的說法，現存最早的記載，來自全祖望的《張蒼水集序》⁶及《明故權兵部尚書兼翰林院侍講學士鄭張公神道碑銘》。⁷不過，兩者說法卻並不相同。《序》云：

吾聞尚書(煌言)既被執，籍其居無所有，但得箋函二大簾，皆中原薦紳所與往來。送入帥府。薦紳輩懼，遣說客請帥焚之。帥府亦恐搖人心，如其請，投之一炬。火既息，有二殘冊耿耿不可熱。左右異而視之，則尚書之集也。說客因竊置懷而出，遂盛傳於人間。……存其集者，祝融吳回。⁸

《銘》則謂：

公〔煌言〕丙戌以前文字皆無存者，今所存者，有《奇零草》，甲辰〔1664〕六月以前之作也；《冰槎集》，其雜文也；《北征錄》，己亥紀事之編也；《采薇吟》，則散軍以後之作，而蒙難諸詩附焉，共八卷。公既愛防守卒史丙之義，遂日呼與語，因得藏公之集。有宜興人徐堯章者，從丙購之，曰：「公之真跡，吾日夕焚香拜之，不可以付君。」堯章乃抄以歸。⁹

若細心分析，《序》中所記，頗有疑點。(一)文中既言清人所得「皆中原薦紳所與往來」書

4 《張集》，頁 51 - 52。

5 同上注，頁 52。

6 同上注，頁 331 - 333；是序亦見於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編》，臺北：華世出版社，1977年，卷二十五，《張尚書集序》，頁 992 - 993。

7 《鮚埼亭集》，頁 111 - 120。

8 《張集》，頁 332 - 333；《鮚埼亭集·外編》，頁 993。

9 《鮚埼亭集》，頁 119。

信，餘燼中卻竟得張氏遺集，似乎後語不對前言；(二)對殘冊未壞於火之記載，亦近乎神話；(三)說客在清吏監視下卻仍能竊書以出，恐不可能。至於《銘》中所記，謂煌言遺集，乃親交予防卒史丙私藏出獄，因之得以傳世，亦未必盡然。考煌言康熙三年七月十七日(1664年9月6日)被執，十九日(8日)囚杭，至九月七日(10月25日)就戮，閒置時間約只有五十天，¹⁰他當時身無長物，恐不能重新整理全集書稿，其交予防卒者，頂多只能是獄中新作。不過，就史實而論，煌言既為清人捕獲，身邊所有又遭籍沒，遺著之得諸清吏，應無可疑。大抵現存煌言遺集乃源自所遺書稿及獄中近著，其得以流傳於世，當有賴清吏中同情其遭遇者暗助，惟因礙於禁忌，當事人並未將原委說明，日子久遠，史實逐漸模糊，遂生穿鑿附會之說，甚至使事情蒙上神秘色彩。

自煌言死後，遺著被列為禁書。¹¹乾隆朝曾先後數番查燬；¹²所以張氏遺集在光緒二十七年(1901)以前，一直未有機會刊行，民間只有抄本流傳。¹³從今存《張蒼水集》之序、跋來看，徐孚遠(1599—1665)為最早讀過部份煌言著作的人。其時煌言剛完成《奇零草》，隨即送交徐氏過目，並請為之序。¹⁴惟於煌言身故之後，作品散失，雖然姜宸英(1628—1699)、宗稷辰(1788—1867)、陳爾幹(1832—1869)及平步青(1832—1896)等人均先後讀過張氏遺作，¹⁵但都沒有見到全面的作品。

張氏遺書，至全祖望整理後，方有較為完備的本子出現。據全氏的記述，他最初所見之張氏遺文共有八卷，¹⁶經其「詮次審定」，共為十二卷，計有《冰槎集》、《奇零草》、《采薇吟》及《北征錄》；此外，並附以《鄉薦經義》一卷，《詩話》二卷，《年譜》一卷。張著經全氏整理後，乃有定本。其中《冰槎集》為「奏疏書檄」，《奇零草》、《采薇吟》為「古今體詩」，《北征錄》為「己亥紀事」，《鄉薦經義》為「墨程燕銘」之筆，《詩話》、《年譜》則為全氏用煌言「集中贈答之人與其事」而作成。¹⁷

10 參看拙作《張煌言之反清思想及活動》，香港大學哲學碩士論文，1990年，頁78—79。

11 姚覲元《清代禁燬書目(補遺)》，頁44、111、161、186—187；孫殿起《清代禁書知見錄》，頁150—151；雷夢辰《清代各省禁書彙考》，頁212、232、249。

12 乾隆四十三年(1778)，禁書目(見姚覲元《清代禁燬書目(補遺)》)中有張皇[煌]言《北征紀略》(頁161，此書即今存之《北征錄》)；五十三年(1788)，禁書目又有張煌言《北征紀略》(頁44)及《冰槎集》(頁111)；雷夢辰《清代禁書彙考》記浙江奏禁書目中，乾隆四十二年(1777)六月十五日有《北征紀略》，十一月初二日有《北征錄》抄本，四十七年(1782)有《冰槎集》抄本(見頁212、232、249)。由是書所見，查禁時只有浙江一帶呈奏過煌言遺集，則當時其流傳似應只在省內。

13 《出版說明》，《張集》，頁5。

14 徐孚遠《徐序》，見《張集》，頁327—329。

15 姜宸英《姜序》，《張集》，頁330—331；陳爾幹《陳跋》，見《張蒼水先生專集》編輯委員會編《張蒼水先生專集》(臺北：寧波同鄉月刊社，1984年)，以下簡稱《專集》，頁222—223；宗稷辰《題明張蒼水獄中詩稿後》，《張集》，頁335—336；平步青《采薇吟跋》，《張集》，頁336—337。

16 《全銘》，頁119。

17 《張集》，頁332—333；《結埼亭集·外編》，頁993。

張著雖得全氏苦心編集，又曾得有心人轉相傳抄，¹⁸但由於未能刊刻，至清末已有殘闕。據丁丙(1832—1899)記載：

公[煌言]集先無刻本，爲人所秘，全謝山[祖望]竭力搜羅，僅得八卷。當日傳鈔，亦鮮遺本。余不忍公集湮沒，求之故家，偶得舊鈔數冊，喜而欲狂。顧編錄失次，香雜不可整理，因寄示傅節子[以禮，活躍於1885年左右]太守。太守與余同有志於刊校公集者也。太守費數月之力，編成十二卷，因併《經義》及《年譜》、《墓志》合成一集，而公之詩所遺者寡矣。¹⁹

傅以禮則云：

是編[張集]從丁松生[丙]明府借讀，暇日手校數過，是正頗多，惜所載祇《奇零草》[原註：《采薇吟》即散附《奇零草》中]、《北征錄》、《鄉薦經義》，暨全氏[祖望]所撰年譜，而《冰槎集》全闕。爰據湖郡李氏舊鈔潘文慎[錫恩，？—1867]《乾坤正氣集》，補所未備，彙鈔一帙以贈。²⁰

又謂：

集內諸文，皆有時事可考，而李氏舊鈔《乾坤正氣集》兩本，均先後失次，殊不可解。爰合《奇零草》、《采薇吟》、《北征錄》參證明季稗野，重加排比，勒定《張忠烈公文集》十二卷，而以《經義》、《年譜》附之。視謝山《張尚書集序》所載，祇闕詩話一種耳。²¹

由此可見，煌言遺文，自其去世之後，最少曾有過兩次有系統之全面整理及傳鈔，而經全氏編纂，丁、傅補輯之鈔本，即爲日後黃節(1873—1935)校勘編訂，由國學保存會印行之底本。(詳下文)

張氏文集於光緒二十九年(1901)第一次印行，由章炳麟取甬上張氏鈔本排印。²²然而，此本所缺頗多，²³並非善本。宣統元年(1909)，又有國學保存會的黃節校本。黃本乃鄧實(1877—?)於光緒三十二年(1906)取丁本交黃節校勘，歷三年而成者。其間黃、

18 參閱注 15。

19 《專集》，頁 226。按：丁丙所謂八卷，當指全氏初見之張集八卷遺稿(後經全氏整理成十二卷)，而非指全氏定本爲八卷。

20 《博跋一》，《張集》，頁 339。

21 《博跋二》，《張集》，頁 339。

22 章太炎《章序》，《張集》，頁 333。

23 黃節謂：「章氏[太炎]所刊《張蒼水集》因仍舊本，編錄失次，較此本[丁本]闕文三篇，詩四十五篇，又無《詩餘》、《經義》兩種。」(《黃跋一》，《張集》，頁 340)

現存張氏著作內容及其在南明史研究上的價值

現存張氏遺集主要由《冰槎集》、《奇零草》、《采薇吟》及《北征錄》四編所組成。

《冰槎集》有序言一篇、書信十四篇、祭文七篇、奏章六篇、贈序六篇、酬答文字兩篇、檄一篇、研銘一篇，合共三十八篇，為煌言由順治八年辛卯(1651)至康熙三年甲辰(1664)間的文章，亦為了解煌言言行思想的重要遺著。其中《賀延平王啟》、26《上監國啟》、27《與張承恩書》、28《上延平王書》、29《上行在陳南北機宜疏》、30《答曹雲霖監軍書》、31《上魯國主啟》(三篇)、32《答延平世子經書》、33《答閩南縉紳公書》、34《復盧牧舟司馬若騰書》、35《答唐枚臣書》、36《祭監國魯王表文》³⁷及《自用研銘》³⁸十五篇，均反映了煌言北伐之志、對明室之忠貞及他對抗清活動的看法和策略。

其次，《復田提督雄、張鎮杰、王道爾祿書》、39《復郎廷佐書》、40《答趙廷臣書》、41《答趙安撫書》⁴²及《貽趙廷臣書》⁴³五篇亦充分反映了煌言堅貞不降的氣節，同時亦可從中略見清人招降南明遺臣的情況；《子房報韓論》、44《李陵論》⁴⁵二文乃煌言申斥那些失節降清而砌言事清無害臣節以求為自己開脫之人的作品。此二文乃了解煌言對人臣出處看法的重要資料。此外，《祭建國公鄭羽長鴻遠文》、46《祭定西侯張侯服文》、47

26 《張集》，頁6—7。

27 同上注，頁13—15。

28 同上注，頁15—17。

29 同上注，頁18—20。

30 同上注，頁20—22。

31 同上注，頁22—23。

32 同上注，頁26—29。

33 同上注，頁30—31。

34 同上注，頁31—32。

35 同上注，頁32—33。

36 同上注，頁37—38。

37 同上注，頁39—40。

38 同上注，頁50。

39 同上注，頁2—3。

40 同上注，頁10—12。

41 同上注，頁33。

42 同上注，頁33—37。

43 同上注，頁40—41。

44 同上注，頁42—44。

45 同上注，頁44—45。

46 同上注，頁5—6。

47 同上注，頁22。

《祭延平王文》、48《祭平夷侯周九苞文》⁴⁹及《祭四叔父文》⁵⁰五篇則反映了煌言在抗清活動上的感情矛盾。

《奇零草》為煌言詩集，共收張氏遺詩四百四十三首，⁵¹大抵為順治三年丙戌(1646)左右至康熙元年壬寅(1662)期間的作品。⁵²相對於《冰槎集》而言，《奇零草》中詩歌的內容較為感性，乃煌言用以寄託國仇家恨、旅居懷鄉之作，全集約可分為五類：第一類為吟詠軍旅生涯者，如《舟行阻風口號》、⁵³《再入長江》⁵⁴和《舟次三山》⁵⁵等；第二類為感懷飄泊生活者，如《感事四首》、⁵⁶《述懷二首》、⁵⁷《書懷》、⁵⁸《秋懷三首》⁵⁹及《島居八首》⁶⁰等皆屬之；第三類為悼念亡友之作，如《輓肅虜侯黃虎癡》⁶¹及《哭定西侯墓》⁶²等；第四類為舒發思鄉之情者，如《余自丙戌蹈海，奉違家君定省已四載矣，茲當待罪軍旅，每一念至，為之黯然》⁶³及《得家信有感》⁶⁴等；第五類為表白個人心跡者，如《答古虞偽令》、⁶⁵《五月既望行營恭祝監國魯王千秋有感》⁶⁶及《三月十九日有感甲申之變》⁶⁷等。這些作品都是了解煌言內心世界的重要資料。

《采薇吟》為煌言晚期詩作，全篇共有遺詩五十一首，詞六闕，寫作時間為康熙三年壬寅至五年甲辰(1664)散兵之後。由《山居即景》⁶⁸至《有所思》⁶⁹三十六首詩及六闕詞，其

48 同上注，頁 30。

49 同上注，頁 50。

50 同上注，頁 24 - 26。

51 《張集》所載詩題合計詩目三百十四，詩四百四十三首。

52 黃節以《賦贈翁永年中翰燕爾之喜》為丙戌(1646)以前作品(《張集》，頁 52)，但全祖望曾謂煌言丙戌以前文字皆無存。今考詩的內容，則黃說似較近於事實。不過，丙戌以前之作，數目只佔極少數。

53 同上注，頁 59。

54 同上注，頁 116。

55 同上注，頁 130。

56 同上注，頁 61。

57 同上注，頁 71。

58 同上注，頁 82。

59 同上注，頁 114。

60 同上注，頁 127 - 128。

61 同上注，頁 68。

62 同上注，頁 120。

63 同上注，頁 67。

64 同上注，頁 138。

65 同上注，頁 105。

66 同上注，頁 131。

67 同上注，頁 151 - 152。

68 同上注，頁 167。

69 同上注，頁 175。

中《答趙廷臣》⁷⁰兩首，為嚴拒清人勸降的詩，《滿江紅》⁷¹兩闕為宣洩亡國傷痛的，其餘則為煌言吟詠島居生活之作。其次，由《甲辰七月十七日被執進定海關》⁷²至《絕命詩》⁷³十五首則為被囚獄中，行刑前之作，讀之大有「不禁為之案歎」⁷⁴之感，是張氏遺作中最為後世所傳誦者。

至於《北征錄》，⁷⁵乃煌言記述順治十六年(1659)與鄭成功(1624—1662)北伐的史事。篇中對於當時北伐，由籌劃到進軍以至失敗之情況均作了詳盡記載，為研究南明史及鄭成功抗清活動的重要史料。

從史學角度來說，《張蒼水集》對於保存明清交替一段歷史資料的貢獻是不容忽視的。張氏為少數與南明魯(1645—1653)、桂(1647—1661)政權相始終的重要人物，他的詩文，保存了大量這方面的一手資料，後世研究南明史者，多受其惠。綜觀在比較重要的南明史著中，多有記載張氏的抗清活動，而在用張氏遺著考訂張氏生平的時候，亦採之以考南明史事，如黃宗羲(1610—1695)《行朝錄》中記順治十六年的北伐，就撮錄了相當篇幅的《北征錄》的資料；⁷⁶查繼佐(1601—1676)在《罪惟錄》中，引用張氏遺作的資料亦是非常明顯的。⁷⁷至於全祖望，更大量徵引張氏的著作，如利用煌言的詩文以駁斥鄭成功沉殺魯王(朱以海，1618—1662，1645—1653監國)之說，即為一例。⁷⁸此等例証，正好說明了《張蒼水集》在南明史研究上的價值。

除了上述四種外，今存張氏遺作尚有《鄉薦經義》⁷⁹一卷，內裡包括「墨程燕銘」之作七篇。此等作品，雖然文筆在當時頗為人所讚賞，⁸⁰但以現代眼光看來，似乎沒有甚麼意義。

70 同上注，頁174。

71 同上注，頁181。

72 同上注，頁175。

73 同上注，頁179。

74 宗稷辰《題明張蒼水獄中詩稿後》，《張集》，頁336。

75 《張集》，頁192—202。

76 《行朝錄》，卷十一，《賜姓始末》，沈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1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頁198。

77 《張煌言傳》，見《罪惟錄》，頁1562—1565。

78 有關鄭成功沉殺魯王之說，見《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卷一百十六，《諸王傳》，頁3576；而全氏的考辨，則見於《鮚埼亭集》，卷三十一，《明故太僕斯菴沈公詩集序》，頁398。

79 《張集》，頁182—192。

80 《專集》，頁204—206；《張校張集》，卷九，頁十三下至十五下。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The Circulation and Significance of Zhang Huangyan's Collected Works

(A Summary)

Chan Wing-ming

As an anti-Qing activist, Zhang Huangyan (1620–1664) took part in the Zhejiang resistance movement for nineteen years during the Ming-Qing transition. His writings have been considered valuable historical sources because they not only provide significant records of the author's life but also contain many firsthand accounts of Southern Ming (1644–1662) history, especially narratives of the Lu (1645–1653) and Gui (Youngli, 1647–1661) regimes.

However, the circulation of Zhang's works was very restricted in Qing times. First, although Zhang intended to preserve his writings for posterity, a large number of his manuscripts were destroyed or lost in wars. Moreover, under the Qing literary inquisition, his collected works were subject to censorship and completely banned on account of their anti-Manchou standpoint. In fact, before the twentieth century, Zhang's writings did not have any opportunity of being published and the circulation of his manuscripts was restricted to scholars interested in the subject.

Nonetheless, limited readership does not imply limited influence. On the contrary, despite prohibition, Zhang's narratives were frequently cited by historians of Southern Ming history. Since the eighteenth century, Zhang's works have been systemically compiled and edited by scholars such as Quan Zuwang (1705–1755), Ding Bing (1832–1899), and Fu Yili. Following the decline of the Qing dynasty, Zhang's writings gained its first publication in 1901 as a result of Zhang Binglin's (1869–1936) advocacy in the revolutionary movement and have been widely used for the study of Ming-Qing history ever since.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